

Fro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ese Discourse

China's Strateg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叶南客 / 主 编

石奎 张石平 虞淑娟 / 副主编

从中国特色 到中国话语

哲学社会科学的
中国方略

Fro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ese Discourse
China's Strateg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叶南客 / 主 编
石奎 张石平 虞淑娟 / 副主编

从中国特色 到中国话语

哲学社会科学的
中国方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话语: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方略/
叶南客主编.—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32-2803-0

I. ①从… II. ①叶… III. ①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
设-中国-文集 IV. ①C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0387 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话语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方略

叶南客 主编
石奎 张石平 虞淑娟 副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
插页 3
字数 280,000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南客

副主编 石 奎 张石平 虞淑娟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序）

邓 攀 叶南客 石 奎 朱未易 张石平

周蜀秦 黄 南 虞淑娟 谭志云

目 录

总 论

- 3 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 / 林尚立

社会科学和国家建设

- 19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 周晓虹
36 处在转折点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 张康之
53 扎根民族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尚庆飞
65 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学术评价范式的创新 / 潘 涌

学术自觉与中国故事

- 81 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 常建华
110 翻译的使命与翻译学科建设 / 许 钧 曹丹红
124 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观察与思考 / 童 兵
139 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自信 / 栾梅健
152 文学的疆域：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自觉 / 何光顺

学术生产和中国话语

- 175 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个性 / 张一兵 张琳 周嘉昕
- 193 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思考 / 沈斐
- 204 中国管理科学学术话语权构建与高校科研行为引导 / 张正堂
- 216 新媒介形态下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转型 / 姜红

新型智库和中国声音

- 227 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世界一流智库强国 / 任平
- 240 论中国新型智库管理模式创新方向 / 孙洪敏
- 256 智库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探索 / 闵学勤
- 268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协调发展研究 / 刘德海
- 283 智库发展路径的差异化政策分析 / 傅广宛

- 295 跋 / 叶南客

总 论

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

林尚立

社会科学是当今人类安排其社会和生活的主要知识体系。社会科学水平对国家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建设全面恢复，并快速发展，成为引导和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知识力量。中国的崛起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社会科学支撑，因而，发展社会科学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在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回到学科的内核，即学术的建设与发展，其着力点有四：一是人才的培养；二是理论的建构；三是方法的提升；四是资料的储备。

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进行人类生活的自我建构。人是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来建构其社会和生活，这其中，既有顺自然而动的一面，同时也有依人的意志而行的一面。人类越是发展，人的意志在人类生活的自我建构中所占的分量也就越重。但是，人类并不因此可以变得随心所欲，因为，人类是离不开自然世界的。这个逻辑决定了人类社会在古代可以更多地依据自然法则来规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到了现代，则必须更多地依据社会科学来规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萌芽于古代而兴盛于近代，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变得日益重要的原因所在。

社会科学的出现，使人类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分化，形成了人们熟悉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足鼎立的格局。人文科学解决人的生命意志的安顿与张扬问题；自然科学解决人认知和驾驭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问题；社会科学解决人的

社会存在的秩序与安全问题。当今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时刻离不开这三大知识体系的支撑和贡献。对人类整体发展是如此，对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得益于这三大知识体系的生产和发展，而其未来的发展则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知识支撑和创造动力。本文将以社会科学为维度，从中国经验出发，考察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认为，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彼此相互制约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那么，人类史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强调意识形态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1]由此推断，与“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相对应，人类史就应该是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如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相互制约一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因而，也是相生相伴，相互促进，互为依存的。

意识、认知与知识是人类得以傲立自然世界的根本所在。人的意识，不仅取向自然，而且取向自身。前者认知了自然史，形成了自然科学知识；后者认知了自身，形成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里不谈，这里关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

人对自身的意识与认知是与生俱来的追求，开始是混沌的，随着认知的加深，而逐渐清晰，并形成了对人、自然与社会最具整体性的认知和思想体系。这种“整体性的认知和思想体系”构成人类知识创造的母体。不同的民族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下形成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的，因而，相互之间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为不同民族的知识生产和创造留下了不同的文化与智慧胎记。这种胎记虽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知识生产、创造和沟通所必然拥有的共同基础，但却影响不同民族进行知识生产、创造和沟通的认同取向，从而产生出个性不同的人类文明体

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创造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的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古延续至今的几大文明体系，都有自己的轴心时代，西方文明体系的轴心时代是古希腊，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不同的文明都在自己的轴心时代定位了本民族认识人、自然与社会的出发点和思想运动轨迹，从而赋予知识和文明的创造以自己特性。

人类关于人、自然与社会的最初知识创造就是在这个母体中进行的，开始是综合和相通的，随后伴随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拓展和深化，知识体系内部开始分化，有了专门知识的发展。但是，只是到了近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分野才开始从内部转向外部，其中部分知识开始脱离“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第一个完成了这种独立，紧接着是社会科学。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独立不是知识体系分裂的产物，而是知识体系专门化的结果，因而，与其说是独立，不如说是分立，因为，它们的根系都没有从既有的“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中拔出，相反，依然根植其中，并持久地从“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获得滋养，其中包括哲学与艺术，哲学关系到建构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艺术关系到建构知识体系的想象与审美。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对这种滋养的依赖更强一些。

正如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一样，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促进知识体系的专门化。人在自然中诞生，因而，是在自然的怀抱中来建构起“整体性的认识和思想体系”的。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是人类不断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内在动力，并由此推动生产的进步与发展，其本质取向就是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创造属于人自身的生活和世界。于是，人们就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基础上，创造了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基于自然逻辑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基础上，创造了基于人自由发展逻辑所形成的人造的社会生活。前者，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系统化建构和发展；后者，孕育了现代市场、社会与国家，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系统化建构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出现了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面，进而影响

到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2] 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深刻变化，正是社会科学产生的重要时代背景与现实基础。雅斯贝斯指出：“以往，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使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3] 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有目的地塑造生活”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产生与自然科学的出现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社会科学来解决生产工具变化之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关系的深刻变化，那么自然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文明的进步与文明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效用，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然科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贡献度。

历史的逻辑表明，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发展的连带成果。因而，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传统的人文知识不同的取向，即寻求精确化。当然，这种取向也与社会科学所服务的现代社会与国家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近代国家制定政策需要更加精确的知识。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近代国家制定政策对更加精确的知识的需求是推动社会科学生产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所在。^[4] 所以，他们对社会科学作了这样说明：“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5]

近代世界的潮流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基点就是人们疏离自然怀抱，疏离传统的共同体，开始建构以个体为单位的新的生活、新的生产和新交往。这种疏离虽然带来的个体的自由空间，但也深刻改变了每个人的生存系统，人们再也无法直接从自然和共同体中获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为此，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自由的同时，不得不在自然世界之外重建自己的生存系统，在这种新的生存系统中，政府、社会与市场将成为主要依靠的对象。显然，这是人造的生存系统，不论是市场，还是政府，还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都是人们为了现代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有目的地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的最大需要，除了价值共识之外，就是社会科学理性与

精确的知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市场、社会与国家，既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物。其中，现实的生产和社会运动是基础，而人们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所形成的理想追求和制度设计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孕育了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保障了现代化发展。

二

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实现方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重新组织自己的生存、生产与生活。这种重新组织的行动，虽然植根于现实社会，但其最终的依靠是国家。因为，这种重新组织，不是从自然的逻辑出发的，而是从文明创造的逻辑，即人造的逻辑出发的。这种人造逻辑的实践主体，除了个体本身之外，就是人们建立的国家，因为，只有通过每个人都赋予权力从而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才能构建起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体系。所以，现代化的发展，就一定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设。现代国家建设最本质的使命就是基于文明的逻辑，重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系统，以保障人们的自由与发展。显然，这应该是一套有机的系统，富有生命力，不仅具有其内在的价值灵魂，而且具有其相应的组织基础和制度架构，是价值、组织和制度的有机统一。这种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无疑是天然的，也是内在的。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协会会长比约恩·维特罗克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出现与发展同现代国家的演变，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工业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的现代城市社会有密切的交互作用关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及北美出现的国家新形式的特点在于管理与传播能力的大量增长，社会科学的兴起就是这种增长在学术论说方面的对应表现。”^[6]当然，社会科学要适应这种增长，满足这样的需求，支撑起这样的国家建设，除了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之外，还需要动员自然科学的知识力量和哲学与艺术的思想力量。

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象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7] 必然是围绕着国家中轴运转的社会科学，将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即作为学术和科学的社会科学与作为建构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知识的社会科学。这种紧张不仅存在于社会科学本身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择取上，而且存在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建制上，即社会科学是作为学术建制来进行生产和发展，还是作为服务现代国家所特有的政治建制来进行生产和发展。正是这种紧张，使得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路线不是笔直向上的，而是充满了波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力量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合理程度。比约恩·维特罗克在分析社会科学与国家发展时指出：“比较分析表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大势所趋；反之，倒是问题甚多，一波三折，而且往往在这些方面顾此失彼。就是说，除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及学术建制所固有的问题与潜力，显然还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这两个重要方面。”^[8] 因此，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如何自觉地平衡学术与政治、科学理论建构与国家体系建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如何合理地协调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与社会科学担负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国家给予社会科学发展的条件与空间以及国家价值取向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更具决定性。

作为学术与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价值、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创新和超越来实现的；作为国家建设的知识基础，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价值建构、理论阐释与制度创新获得发展的。因而，任何社会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内在紧张，首先是价值上紧张。如果作为学术与科学的社会科学所认同的价值取向与国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耦合性，那么这种价值上的紧张就会缓和许多。在现代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耦合的最大基础就是政治民主与学术民主的共存与互动。因而，民主的建设与发展就往往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与社会基础。正因为社会科学对民主发展具有内在的需求，所以，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与变革，往往离不开社

会科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因此也成为社会与国家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日益突破国家的界限，日益作为世界性的知识体系来发展。但是，社会科学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依然生成于国家这个政治空间之中，而且现代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不但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减弱，相反更加迫切。因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现代国家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内部，而且更多地来自外部，内外互动，使国家不得不处于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现代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决定了社会科学，不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必须承担起国家体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任何现代国家只有解决了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所以，“一切新的国家形式今后都不得不借助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正确合理，并使其成员能够理解。不论专制的或是现代的国家形式都具有这一特点”^[9]。在国家正当性缺失的条件下，社会科学的这种论说更多地是基于国家强力的压迫。但是，从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科学通过其应有的学术论说来建构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建构性，决定了这种学术论说在本质上不应是消极和被动的，相反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其内在使命是通过积极主动地学术论说，将国家的发展引导到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轨道上来。从这个角度讲，任何社会的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要是不能承担起建构和论说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使命，不是国家无道，就是社会科学无能。

现代国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建构，离不开社会科学。由于现代国家的实际存在，是在全球社会中存在，因而，这种建构，不仅关系到国家在其内部社会的存在，即国家政权的稳固存在；而且关系国家在其外部社会的存在，即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稳固存在。因而，撇开社会科学对增强国家组织与配置资源的能力所具有的意义不谈，就社会科学直接关系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言，社会科学无疑是现代国家能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水平与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国家在现代社会与全球空间中存在的实力与能力。所以，对于任何力图崛起和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要不要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的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实现国家能力增长的资源基础和推动力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科学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三

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与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是作为“西学”的组成部分进入中国的。“西学”一进入中国，就被赋予了很强的历史使命：即实现自强，使传统的帝国能够抵御住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实现新的发展。“西学东渐”运动最终没能挽救传统帝国，但帝国的崩溃，不但没有中断“西学”进入中国的进程，相反，随着中国在帝国解体之后进入现代国家建设的时代，“西学”全面进入中国，并孕育了与传统“旧学”完全不同的“新学”。“西学”的进入以及“新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之后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全面开花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辛亥革命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强烈历史冲动，也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全面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现实需求。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启动国家建设进程，伴随着这个进程的展开，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第一次兴盛。尽管这个兴盛发展的时期不长，但对中国的发展却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它开启了中国以社会科学为知识基础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并通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而得到更加全面和整体的展现。

新中国政权确立之后，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但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很快就将建设社会主义与建设现代国家混淆起来，将建设社会主义直接等同，甚至是替代建设现代国家。于是，在意识形态的作用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

发展，作为整体的国家知识体系来替代或消融社会科学专门知识体系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从而将对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科学的专门知识体系逐渐消解掉，这其中就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实践证明，意识形态不能替代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建筑在现代国家建设基础之上。所以，“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从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出发，不仅厘清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将全面恢复和发展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科学发展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所在，科学发展的全面启动与改革开放的启动几乎是同步的。这全面启动的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而且包含社会科学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三个多月，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上就发出了尽快进行社会科学补课的指示，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够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急起直追”。^[10]正是在这个指示和号召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并在90年代之后，逐渐进入第二次兴盛发展时期。今天，在国家层面，社会科学（党和政府文件的准确表述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被视为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同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知识体系，两者的关系被喻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开放与引进中开始的一样，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全面恢